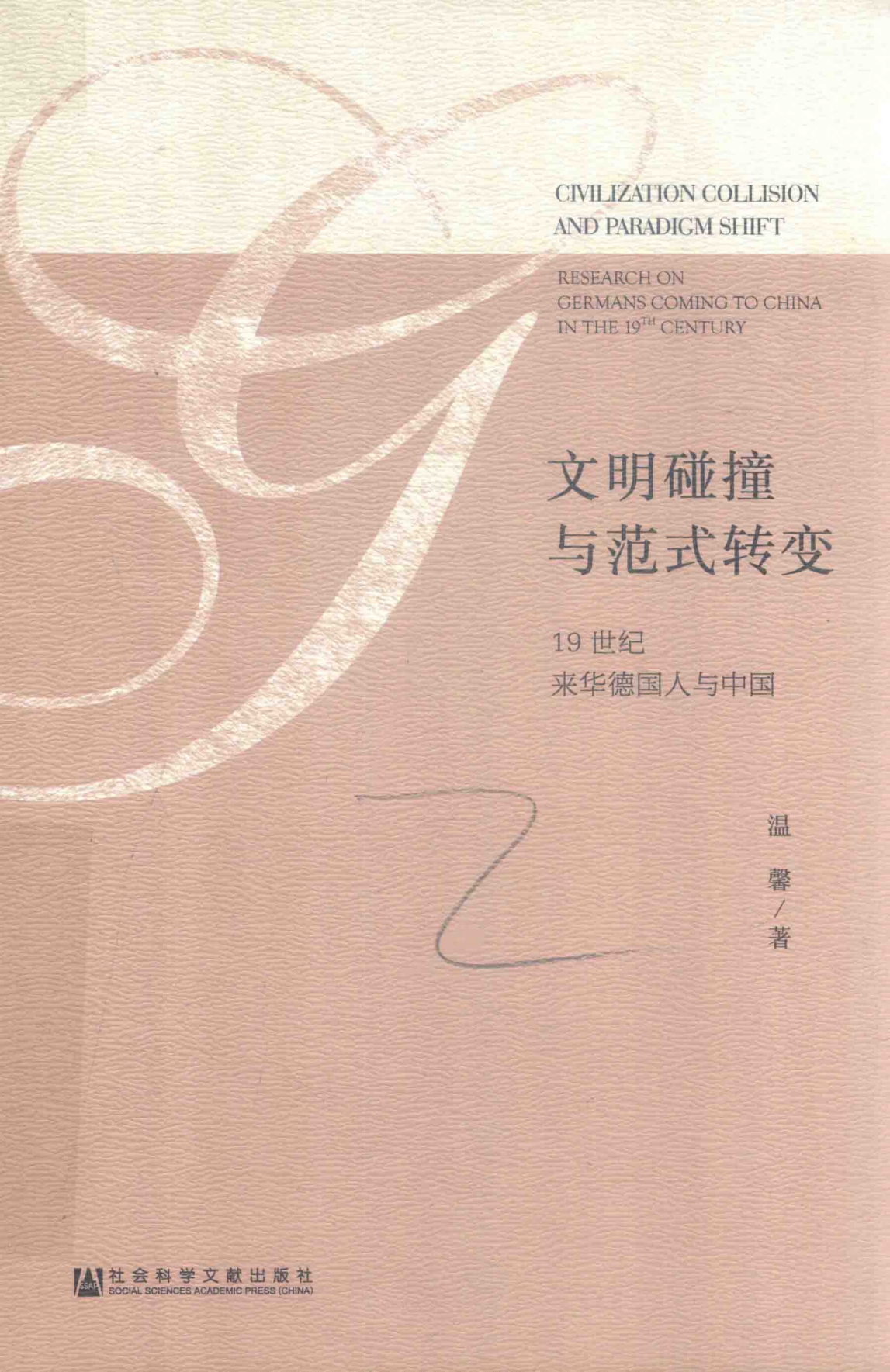




CIVILIZATION COLLISION
AND PARADIGM SHIFT

RESEARCH ON
GERMAN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文明碰撞 与范式转变

19 世纪
来华德国人与中国

温
馨 / 著

温
馨 / 著

文明碰撞 与范式转变

CIVILIZATION COLLISION
AND PARADIGM SHIFT

19 世纪
来华德国人与中国

RESEARCH ON
GERMAN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碰撞与范式转变: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
温馨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201 - 2261 - 0

I. ①文… II. ①温… III. ①文化交流 - 研究 - 中国
、德国 - 19 世纪 IV. ①G125 ②G15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9234 号

文明碰撞与范式转变: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

著 者 / 温 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王小艳

责任编辑 / 王小艳 程丽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261 - 0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文明化”和有关中国的知识

—

19 世纪，尽管在英语世界中，“Culture”一词与德语中的“Kultur”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其中所包含的“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含义，当然都是指当时欧洲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时的欧洲人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解读为自己的文化是文明的、优越的，而其他文化则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东方是异国情调的、神秘的、迷信的，这些是相对于西方的正统、理性和科学化而言的。实际上，源于欧洲的知识 and 世界观同样是“给定”的，这些所反映的当然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当人们学习、接受并认同某一特定知识的时候，与其说认同的是“知识”本身，不如说是认同了由权力核心所介入的这一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后现代的理论家甚至认为，知识并非真理的反映，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经过权力介入的知识带给人们的往往是判断力的削弱。因此，对 19 世纪以来汉学知识保持适度的怀疑，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一种态度。

19 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汉学界，实际上一直为“文明化”的研究范式（paradigm of “civilizing” of China）所主宰着。作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由生长在中国的本土学者转移到长期生活在欧洲的学者那里之后，作为客体的汉学知识本身也经历着由欧洲汉学家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学术规范、学术兴趣重组的过程。在文明化范式的过程中，尽管这些汉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但主导思想却都是传播所谓欧洲的文明。

对此，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 -）指出：



文明人有责任，甚或有义务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样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给蛮荒之地带来安定，宣传一种自认为正确的信条，或者干脆就是为野蛮人做好事。“文明布道”主张受到凡此种理由和动机的滋养。“布道”在此不一定仅指传播宗教信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普遍的使命感，指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标准和制度，甚至或多或少强迫他者接受。这一切的前提是文明人坚信自身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强朝晖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 1512 页）

经历了复辟时代、1848 年的革命，以及 1871 年的统一，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在 19 世纪同样承担着推广欧洲文化的使命，以其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来华德国学者为例，可以看出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推广欧洲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郭实猎（Karl F. A. Gutzlaff, 1803 - 1851）确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通过派发宣教书籍与医疗传教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中国人福音化。而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 - 1905）希望借助欧洲国家在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技术，使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李希霍芬认为，帮助中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通过在中国建立殖民地推广欧洲模式的经济生产与生活，从而给中国人带来“福祉”。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 - 1946）认为，汉学的知识要融入欧洲的学术规范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和学问。

历史地看，西方学者之前对中国的认识，既不全面，也缺乏实地的考察。而 17 世纪以来耶稣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格义”。因此，真正的有关中国知识的进步，还有赖于诸如郭实猎、李希霍芬和福兰阁这些来华的学者的贡献。

尽管有关郭实猎、李希霍芬和福兰阁的个案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以欧洲当时“文明化”作为一根红线对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群体进行的探讨，至今没有什么突破。因此，温馨的著作在这个方面可谓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尽管上述三位德国学者对待中国和汉学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脱离当时占主导的“文明化”的范式，但是他们同样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知识上的成就。郭实猎除了将《圣经》译成中文外，也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每月统计传》，撰写《万国地理全集》和《大英国统志》；他又将儒家的一些经典翻译成英文，也译介了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苏轼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当然，这是我另外一个博士生史凯的博士论文《中西方知识迁移史视域的郭实猎译述研究》的内容。

李希霍芬除了最早提出黄土高原的“风成论”外，也发现了胶州湾，同时也最早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人类地理经济学角度对中国进行了考察，认为，贸易交换的发生为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变迁创造了条件。温馨在书中也指出，奥斯特哈默甚至认为，李希霍芬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 1920）的“现代化理论”相提并论（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福兰阁在汉学方面的成就，除了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Bde. Berlin 1931 - 1952）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了。因此，即便是今天看来，这些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具体进步，依然是我们要肯定的。西方的汉学，并非仅仅是将对中国的想象与片面的观察转化为正规的知的过程，而是通过诸如上述三位学者的实地考察，不断论证而艰难形成的。凡此种种，通过阅读本书可有所收获。

三

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



一是有一定的史观。以“文明化”范式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对 19 世纪的三位由德国来华的学者的“中国观”进行梳理，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书中，温馨不仅梳理了这三位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阐述了他们在宗教、科学和汉学方面对中国未来“文明化”所作的努力。历史研究如果没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也就无从走向深入。

二是所使用的史料大都为这三位历史人物的德文和英文相关论著和档案文献。不论是郭实猎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记》（*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 1832, 1834*），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国》（*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1877 - 1911*），还是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Sagt an, ihr fremden Lande*” - *Ostasienreisen Tagebücher und Fotografien 1888 - 1901, 2009*）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仅这三部书就有几千页之多。温馨能从中寻根究底，实在不容易。此外，她在波恩大学访学期间，在位于伍珀塔尔（Wuppertal）的德国新教联合会档案馆（Archiv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以及柏林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Auswärtiges Amt Politisches Archiv）查到了相当重要的原始档案。这些对于一位做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不论是郭实猎 1827 年书信的中文签名，还是 1888 年柏林东方语言学院教习桂林给福兰阁出具的中文评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拉丁文中有一个说法：Homines dum docent, discount，相当于汉语的“教学相长”。温馨是我指导的前几批的博士生之一，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相当多的东西：这里面既有相关的知识，也有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在此，除了祝贺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出版之外，还要感谢包括温馨在内的我的学生们，重读你们的论文，让我愉快地回忆起你们在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求学的岁月。这当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了。

是为序。

李雪涛

2018 年 6 月于北外历史学院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话题缘起	001
二 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005
三 文献综述	015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	032
第一章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联结	037
第一节 古罗马至中世纪：欧洲文明之孕育	038
第二节 从大航海时代至 18 世纪末：欧洲文明扩张之萌芽	046
第三节 16~18 世纪：日耳曼与中国文明之交流	057
第二章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及其旅华记述	062
第一节 19 世纪德国对中国之渗人	064
第二节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综述	068
第三节 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之旅华记述	080
第三章 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识	109
第一节 中国社会之发展状况	109
第二节 中国人之人性	132
第三节 中国人之精神信仰	153



第四章 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与中国文明的碰撞	165
第一节 郭实猎的基督教文明范式：对中国之期待	166
第二节 李希霍芬的科学技术文明范式：对中国之开发	182
第三节 福兰阁的学术文明范式：对中国之尊重	191
第五章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的文明范式转变	201
第一节 历史与个人因素双重作用下的文明范式	202
第二节 三种文明范式的内在关联：批判与发展	216
第六章 结语	224
附 录	232
附录 1：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名录（按来华时间先后排序）	232
附录 2：本书主要参考旅华记述原始文本目录中译文	240
附录 3：本书涉及中国之地名译名对照表（以外文首写字母为序）	245
附录 4：部分档案书影（共 5 份）	247
参考文献	252

绪 论

一 话题缘起

欧洲^①与中国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由来已久，从“多元现代性”的视角考察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关系的动态发展及演变进程，能够为当下的世界提供重新审视近代中欧文明交流史的另一种可能。“现代”（Moderne）一词的缘起与19世纪的欧洲“文明”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这样一个突出的时期，欧洲精英阶层坚信自己体现着世界顶级文明，在此种露骨的自信和优越感的驱使下，欧洲人通过与中国的交流互动将“现代性”逐步引入中国，特别表现为通过与中国文明的相遇与碰撞实现欧洲与中国的文明对话。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 - ）认为，文明和文明化的语言是19世纪的主导语言。^②“文明布道”（Zivilisierungsmission）确切来说是一种普遍的使命感（Sendungsbewusstsein），是在坚信自身生活方式优越性的前提下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标准和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存在或多或少的强迫。^③

回溯历史，欧洲人与中国文明的相遇与碰撞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两次较大

① 本书中的“欧洲”并非严格按照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划分的地域概念，而是特指位于欧洲中、西部的，在近代以来参与文明对外扩张的国家及地区，尤其是对中国进行文明扩张的英、法、荷等国的国家及文化概念，此处也包括1871年之后实现正式统一的德国以及在此之前的德意志地区。

②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10, S. 1173.

③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10, S. 1185.



的范式转变，欧洲与中国的现代性相遇也始终贯串于此段历史进程中。18 世纪末之前，欧洲人认为文明这一进程还尚未在自身社会内部完成，因此，他们在与中国的交流中也从未表现过对中国进行文明布道的企图，反而将辉煌的古老中国文明视为学习和敬仰的先进参照，此种范式贯串于 18 世纪末之前的中欧文明交往之中。历经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之后，欧洲人自 18 世纪中期起逐渐认为自己已拥有作为一个稳固、成熟文明成果提供者的能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及自由贸易、自由开放的人性、基督教精神信仰等文明概念成为他们进行对外民族及文明扩张的辩护词。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19 世纪是一个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时代：欧洲人与中国文明交流的范式从之前的崇敬转变为蔑视，他们对待中国文明的态度越来越多地被烙刻了负面情绪，封建、落后、僵化、反动成为 19 世纪欧洲人视野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代名词。19 世纪欧洲人关注的不再是是否应当介入中国的固有文明体系，而是如何使中国在欧洲现代文明影响下进入由欧洲人构建的世界体系中。20 世纪之后，欧洲人对待中国文明的范式再次发生转变，客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促使欧洲人开始冷静思考与中国古老文明的相处之道，从多元文明共存中汲取自我发展的养分，此为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的第三种范式。

以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相遇与碰撞的两次范式转变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基础，19 世纪在整个中欧文明交流进程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便得以凸显。作为后起并发展迅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人直到 1884 年都没有海外殖民地供其进行“文化工作”^①，19 世纪德国与中国的文明交往相较于英法等国也具有其特殊性。在现代性背景下关注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在与中国文明真实相遇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明碰撞与文明范式转变，对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中德近代交流史以及中欧关系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及价值，本书也试图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在知识迁移的历史场域中初步解释近代以来复杂的

^①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10, S. 1176.

“多元现代性”。

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组织与制衡、经济贸易沟通、科学技术发展、精神文化与信仰等与近代人类社会进步相关的一系列因子为核心,通过此种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考察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的文明碰撞及其范式转变。在梳理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的基础上,本书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三位19世纪来华的德籍代表性人物之上:新教传教士郭实猎^①、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以及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世纪来华德国人通过不同的个人意识与在华经历对中国文明现状得出不同认知,并以此为基础与中国展开文明层面的对话与碰撞,呈现不同的文明范式。这些文明范式同时参与到19世纪欧洲人认知中国文明的范式过程中,从微观角度构建出自“现代性”相遇以来,欧洲人与中国文明碰撞的范式转变的宏观过程,使其具备更为丰富立体的维度。本书将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作为19世纪来华德国人之代表进行研究,主要考量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从历时性角度来看,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分别代表了在19世纪前期、中期、末期三个不同时间段来华的德国人,如此划分的三个时间段基本能够与该三个时间段之中德国与中国互动交往关系的基本趋势相吻合:第一阶段的来华德国人以非政府派遣的自由来华为主,第二阶段以来华探索考察为主,第三阶段以在华大规模渗透与殖民扩张为主。

① 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中文译名多为郭士立、郭实猎、郭实腊、郭士利等,本书所使用的是经考证后他生前自用的中文名“郭实猎”。郭实猎1827年4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Riouw(地名)写给莱茵传教会的书信落款处附有其亲笔签名“郭实獵”,该书信为笔者2015年5月于德国新教联合会档案馆所查。另有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先生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所藏郭实猎档案(Gützlaff Papers)的两封英文通信中发现的郭实猎亲笔签名“郭实獵”,以及郭氏为《常活之道传》撰写的序末“郭实猎敬纂并序”,且有各印“郭印”“实獵”的两方印章,又可见香港海事博物馆(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所藏之郭氏亲笔签名“郭实獵”的剪影画。参见庄钦永《“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5,第2、4页;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导言第32~33页。



第二，从个人职业背景来看，作为传教士、科学家、汉学家的郭实猎、李希霍芬和福兰阁分别代表了不同身份背景的来华德国人，他们对中国萌生兴趣、与中国产生关联并进行交往的原因与方式各有不同。基于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在各自职业领域的知名度和代表性，他们三人可作为 19 世纪来华德籍传教士、科学探险家、外交官及汉学家三种群体的代表，在梳理他们与中国文明碰撞与范式转变的基础上延伸总结不同来华德国人群体与中国产生的文明碰撞及范式路径。

第三，从与中国文明碰撞的具体形式来看，郭实猎希望通过传教打开中国大门，从宗教范式层面实现在中国的文明布道；李希霍芬希望借西方科学技术发现中国，通过对中国地理地质的全面了解，进而借由殖民活动从科学范式层面实现在中国的文明布道；福兰阁则是在尊重中国文明的前提下，从学术范式层面与中国对话实现在中国的文明布道。

第四，从心理角度来看，郭实猎怀着好奇与低调的心态，以发现者的角色推动中国的基督教文明化；李希霍芬怀着完成工作与承担任务的心态，以探索者的角色对中国资源进行科学统计；福兰阁怀着沟通交流的心态，以文明中介者的角色努力实现中德文明的互相理解和尊重。他们三位皆为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当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以旅华记述的文字记录为载体，他们在中国获得的不同感受与认知得以呈现，我们也能够以此为基础揭示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实施文明布道的具体方式、背后的原因以及文明范式转变过程。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两大问题进行文本梳理及论证。一是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现状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在中国实现自我意义下的文明范式。二是如何在近代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变进程的大背景下看待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碰撞以及文明范式转变的历史定位。本书以“文明碰撞与范式转变”为思维主线进行文本梳理与论证。

从文明范式转变的视角出发，在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范式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三位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为例，将这段德

国人对中国的文明范式进程置于全球史与中德交流史中进行历史定位,从文明范式的宏观视角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德及中欧关系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当下中欧文明交流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方式,为本书之初衷与期待。

二 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一) 核心概念之厘定

1. 文明及文明化

“文明”^①一词的古典拉丁文来源是“civis”,本意为“公民的、合法的”,在古希腊政治伦理学发展的影响下,“civis”逐渐发生了向“civilization”(文明)的转变,更多地具备了“代表公民权益的自治城邦”、“社会整体精神的 ethos”以及“政治 polis”的含义。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中,文明一词以往所蕴含的古典意义逐渐减弱,更多地代表一种对人类发展及进步水平的概括式总结。18世纪法国学者就“野蛮状态”提出了对应的文明之观点^②,使文明进入近现代人类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中,文明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对欧洲来说文明更代表了一种国家与民族层面的自我意识。^③

德国的文明(Zivilisation)之概念与英法等国相比有极大不同。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文明在欧洲国家及世俗层面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德语与法语中文明与文化之对立概念:对德国之外的国家来说,文明是涵盖政治、经济、宗

① 拉丁文“civilis”,英文“civilization”,德文“Zivilisation”,法文“civilisation”。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第19页。

③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S. 1.



教、科技、道德等多方面的社会现实的文化实体，是经放大之后的文化^①；德语中文明表示那些在技术、物质层面有次一等价值的有用的东西，而文化（Kultur）则是用于表现自我、表现成就与骄傲的概念，包括更高一级的理想与价值、精神与道德等。^②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 - 1804）从“文明”到“文化”并最终实现“道德”（Moralität）的人类发展模式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德语世界中文明与文化在本质与发展阶段层面的差异。德国形成这种特有的文明概念的原因在于，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大多数思想先进的中产阶级将文明与腐败的宫廷阶层狭隘地联系在一起，使文明这一概念在德国的本土化发生了偏差。^③ 文明与文化在德国的社会起源实质上就是宫廷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对立关系博弈的产物。

1897 年出版的德文《迈尔百科词典》（*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中对文明的定义是：“文明是每个野蛮民族要达到工业、艺术、科学和思想领域更高一层的文化时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④ 在这一层面上，文明一词至少涵盖了先进的社会经济组织与生产生活方式、高水平的科技、高雅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等内容。从这一 19 世纪末的德文百科全书对文明的定义可以推断，此时的德语世界已出现了对传统德语世界中文明定义的扩展。在此处讨论德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并非要给德国的文明做出一个确切定义，而是希望在对德国与英法等国不同文明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明确本书中文明的内涵，即文明体现在政治组织与制衡、经济贸易沟通、科学技术发展、精神文化与信仰等与近代人类社会发进步相关的一系列文明因子，以及近代以来更高层次的人类发进步水平之概括。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第 20 页。

②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卷），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9，第 20 页。

③ Harald Müller, *Das Zusammenleben der Kulturen. Ein Gegenentwurf zu Huntingt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S. 35 - 36.

④ *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 Ein Nachschlagewerk des allgemeinen Wissens*, Bd. 12. Leipzig / Wien: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897. 此处译文转引自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卷），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9，第 334 页。

在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的旅华记述中,常出现“Zivilisation”一词用以指代中国的文明状况,或许对此时的德国人来说,落后的中国需要的仅仅是低层次物质层面的改造,精神生活的高雅文化与中国现实依然相去甚远。即便是来华传教士,也仅仅是将基督教作为对中国实施文明改造的精神工具,其传教的根本目的是借基督教进入中国,通过基督教改变中国人封建落后的生存现实。尽管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文明改造的出发点源自低层次物质层面,但他们却在下意识中始终关注中国人精神信仰层面的发展状况,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将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及其对中国文明改造的文明之内涵延伸为德语世界中传统文明与精神文化信仰的总和,与德国传统理念中的文明相比增添了精神思想、宗教文化等更高层面的内涵,涵盖的意义也更为广泛。从这一文明角度出发考察近代德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也比单纯的物质层面的文明更为全面。

作为文明的衍生词,我们至少能够从三种英文词性出发来理解“文明化”:以动词形式“civilize”出现时代表使文明化的动作,以形容词或副词形式“civilized”存在时表示“文明化的”,以“civilizing”表示正在使其文明化的过程中。文明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段文明化过程的结果,此种意义上的文明化与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所提出的“文明布道”具有内在一致性。

2. 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科技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为该书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意为“研究者在某一科学领域内所实现的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识”,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实践共同体”提供的典型问题及解答的价值、标准、方法、手段、方向及相关的事实背景等。^①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范式不仅仅是一个领域的共同成员

① [美] 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



在某一阶段赞同或默认的信念，更应该被理解为在具体历史背景下的“概念化和介入的示范方式”以及实践规范技巧。^①

范式在一定阶段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以及思维定式组合，在历史进程中尽管存在范式以外的不同声音，然而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广泛接受的主流仍然在范式的范围之内。范式转变渐进地完成了对历史分野的跨越，实现了实质性的转变。范式的转变是因为新范式的出现吸引了大多数下一代的实践者，“新范式暗含着这个领域出现的新的、更为严格的定义和规范”。^②新范式是对过去范式经验的颠覆或发展，不同范式在历史发展中重新整合，通过范式转变实现历史的接续与进步。

根据库恩的观点，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一种特有直觉和视觉的表达”^③作为汉学研究领域范式的定义，将一直贯串于德国城汉学家学术著作中的使中国文明化的范式作为研究内核，进而证明汉学家世界观、范式、学术方法与社会性等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本书通过“形而上学的范式或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构建近代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知的历史进程，在 18 世纪末之前欧洲人尊重学习中国文明的范式、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欧洲人将中国文明视为僵化落后并进行文明改造的范式，以及进入 20 世纪之后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并实现文明多元共存的范式的历史大背景下，进一步研究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碰撞及其不同文明范式转变的历史定位。

本书所论及的 19 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范式贯串于两种文明相遇和碰撞的过程，表明来华德国人通过一定方式及手段参与到 19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中，使中国进入其自认为的文明状态的演进过程。此过程与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及民族的自我意识相关，这里的文明来源于欧洲人自认为在近两

① [美] 托马斯·尼科尔斯编《托马斯·库恩》，魏洪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 115 页。

② [美] 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 19 页。

③ [德] 罗梅君：《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载 [德] 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李雪涛等译，大象出版社，2005，第 14~15 页。